

16 世纪末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

——以万历朝鲜之役的诏令资料为中心

郑洁西

前言

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①突发大军侵犯朝鲜。承平日久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战国乱世的日军锐卒，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个月之内，首都汉城（今首尔）沦陷，两个月之后，北方重镇平壤亦落入敌手。响应濒临亡国的朝贡属国朝鲜的求救，明朝政府作出了出兵援助的决定。战争后来以明、日、朝三国在朝鲜半岛的对峙与讲和为主要形式而持续七年之久（1592—1598），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退而告终结。

在这场战争中，对立国之间，特别是明朝与日本之间，在彼此的战略上都曾有过多重规划。这些战略规划，在战争过程中并非一层不变，也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它们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调整，继而又不断地指导着彼此的战略决策，影响着这场战争的发生、发展。无疑，历史上发生的这场战场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一隅。但是，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战略规划，无论是日本的丰臣秀吉政权，还是中国的万历明朝政府，都曾经有过直接攻入对方国家的战略设想。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预设目标，乃是通过先取朝鲜，再灭中国这一形式，计划将整个东亚乃至全部的已知世界纳入自己版图。^② 明朝政府无疑深刻认识到了日本的这一狂妄图谋，认清了战争的形势，把握好了自己的立场，不惜举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出兵援助朝鲜。战争的表现虽然以朝鲜为舞台，以对峙和讲和为内容持续七年之久，但明朝政府曾多次有过征讨日本战略考虑。^③

本文以 16 世末发生于东亚世界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为时代背景，以明朝政府在此次战争中的相关奏折、诏令为中心资料，考察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过程，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明朝政府的对外战略。

① 丰臣秀吉在明代史籍中有多种称呼，如“关白”、“平秀吉”等等，本文在叙述中统一用为“丰臣秀吉”。

② [朝]《宣祖修正实录》，《李朝实录》第三十一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卷二五，宣祖二十四年（明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丁酉（初一日）。（明）侯继高撰：《全浙兵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三十一，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二卷附录《近报倭警》。[日]《日本战史朝鲜役文书》第三六号《觉》（前田侯爵家所藏文书），村田书店，1978年。

③ 郑洁西：《张文熙与万历朝鲜之役的“对日进攻战略”——明廷的最初“捣巢”之议》，《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9期，国际文化工房，2007年8月。

一、战争前夜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日本图谋侵犯的各种情报^①不断传入明朝，引起了整个明朝朝野的震动，迫使面临危机的明朝政府在针对日本的攻守战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当时明朝在战略上的调整，主要表现为防范倭寇进犯的备战举措和积极征讨日本的进攻战略两个方面。

（一）明朝对日本的备战举措

战争前夜，因为日本情报的不断传入，明朝开始在海防军备上进行扩充，以期防御倭寇的大举侵犯。以万历十九年六月浙江巡抚常居敬上疏请求加强海防为发端，^②万历十九年七月至次年二月，有十数名明朝官员上疏请求扩充军备，加强海防，以为防范倭寇进犯的备战之需。这些建议，或议募兵、选将、造船，加强军事实力，或请加派地方军费，以为备战之用，或就御倭的人事安排提出建议，或要求重新调整战略要点，加强布防力度，大多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并被迅速付诸执行。^③

（二）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

相对于军情到来时的对日防守战略，明朝方面也开始酝酿从根本上消弭倭患的征讨日本战略。通过对以下三个主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前夜，整个明朝朝野在征讨日本这一战略意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1）致仕官员仇俊卿的上书。仇俊卿曾任闽县知县，他在嘉靖年间参加过东南沿海的抗倭事业。万历十九年（1591），年届91岁高龄的仇俊卿在家乡海宁听到了丰臣秀吉企图侵犯明朝的消息。他的反应颇为强烈，马上上书督抚，请求明朝效法汉武帝征伐西南夷的“楼船故事”，出动海军征讨日本，以惩治倭寇，张扬本朝国威：

平秀吉之将入寇也，俊卿年九十一矣，复上书督抚，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以张国威。^④

仇俊卿提出的该种征讨日本战略意向，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个人理想。当时的整个明帝国，无论是仇俊卿这样的民间人士，还是当时的政府官员，乃至当朝的万历皇帝，都有非常明显的征讨日

① 见[明]侯继高撰：《全浙兵制》第二卷附录《近报倭警》。关于这些情报的专门研究，请参考松浦章的《明代海商と秀吉“人寇大明”の情报》，末永先生米寿纪念会编：《末永先生米寿纪念献呈论文集》，奈良明新社，1985年，管宁的《秀吉の朝鮮侵略と許儀後》，《日本史研究》298号，1987年6月，米谷均的《〈全浙兵制·近报倭警〉にみる日本情报》，《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报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4年，第125-142页，等先行研究。

② 《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卷六月庚申（二十七日）条。

③ 参见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明朝对日本的攻守战略》，《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第3辑，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

④ [清]盛枫撰：《嘉禾征献录》，广陵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二一《仇俊卿传》。

本意向。

(2) 两广总督刘继文的奏折。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在其所上的“防倭条议”中,则提出了怂恿葡萄牙人擒斩丰臣秀吉的策略: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其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溥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①

刘继文的这一“销患安邦”之策,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但其后的交涉以及实行,史籍上未见相关记载。

(3) 万历皇帝的敕谕。万历十九年四月,朝鲜向明朝派出了汇报日本企图侵犯明朝情报的使节团。当使者金应南回国之际,万历皇帝向之颁发了一道指令,其用意在于动员朝鲜联合其他朝贡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征讨日本军事行动:

初,我使黄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贻书我国,使之整其军兵,与日本合动,直犯上国。我国举义斥绝,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具由奏闻。中朝先因许议后亦闻倭谋,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②

关于这道指令,朝鲜学者申晙在《再造藩邦志》中指明其为万历皇帝所下之敕谕:

应南之回,天子降敕谕,赏白金、紵丝、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谕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抄击。^③

但是,万历皇帝的这一战略号召,实际上并未得到朝鲜的积极响应。朝鲜在当年即派遣冬至使李裕仁再赴北京,其目的在于拒绝明朝所提议的“合兵征剿”日本行动:

臣窃念,小邦与伊国,虽曰竝居东瀛之堑,茫无际畔,岛屿交错,窟穴险远,此乃天地所以区别丑种也。彼以舟楫为家,寇抄为业,颿风飘忽,往来无常。而小邦之人,则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边吏者,惟守备是图。^④

显然,明朝的该种征讨日本战略,首先遭到了重要参与国朝鲜的反对。相对于明朝积极的备战举措和征讨日本战略计划,朝鲜的对日战略,就如其在应答明朝的联合征讨日本建议时所用的推托之词“短于柁橹,不习下洋。为边吏者,惟守备是图”^⑤一样,无疑是以守备为借口而疏于防范的一种保守战略。

① 《明神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卷二四二,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壬午(二十日)条。

② [朝]《宣祖实录》,《李朝实录》第27册,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甲寅(二十六日)条。

③ [朝]申晙撰:《再造藩邦志》,中韩关系史料选辑6,珪庭出版社,1980,卷一。

④ [朝]《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甲寅(二十六日)条。

⑤ [朝]《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明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甲寅(二十六日)条。

由上可知，早在战争前夜，明朝就对日本具备足够的警惕，并已开始酝酿先发制人的征讨日本战略。这种征讨日本战略，其实与明朝的大国心态有着很大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个屡遭倭寇侵扰之患却一直未能将之根除的大帝国，明朝在战略上对日本的进攻意向由来已久。此外，作为朝贡体系中心国的明朝，其征讨日本战略，更多地是将整个东亚世界也纳入其体系。明朝政府将自己的朝贡国朝鲜、暹罗、琉球，以及当时已经开始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都视为自己征讨日本战略上的重要盟友。

二、万历二十年的“征倭捣巢”提议和“借兵暹罗”“荡剿倭巢”战略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爆发的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给整个明朝朝野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心理震撼。在讨论是否需要出兵援助朝鲜的同时^①，朝议中还出现了另外两种更为大胆的战略提案——直接出兵跨海征讨日本的“征倭捣巢”提议和“借兵暹罗”、“荡剿倭巢”的战略计划。

（一）张文熙“征倭捣巢”的提议

在明廷中最早提出组织明朝海军“征倭捣巢”建议的，是当时的太仆寺少卿张文熙。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事爆发后，面对岌岌“倭警”，兵部尚书石星广集众思，寻求对策。当时的朝论虽“策倭患纷纷”，却多“无能出奇制胜者”。惟张文熙提出的“调四省兵往以捣巢”之计颇有“奇策”之誉。张文熙上奏，以“调四省兵往以捣巢为请”，认为“调集四省舟师，奋勇捣巢”可以“牵其东归，杜其内犯”，万历皇帝御览之后批示：“兵部看议来说。钦此”。命兵部讨论定义之后再作汇报。^②

因为史籍的缺载，兵部的讨论结果无从而知。但是，张文熙所提出的“征倭捣巢”建议，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官员的弹劾。

吏科给事中杨廷兰于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上疏称：

近日张文熙御倭一疏尤为乖谬。动四省之兵，连十万之众，以试之海上，风涛出没，只葬鱼腹，安能捣倭穴耶？方谋犯内地，大司马征兵募卒尚虑众寡不敌，而又欲分师出海，图必不可成之功，计孰踈于此者？^③

对张文熙的“捣巢”之说大加挞伐。

一个月后，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也上奏反对张文熙的“捣巢”提议。对于张文熙的“捣巢”之策，徐桓提出“五难”之说，称张文熙此奏“未深长思”。他根据治病用药的“急则治其标，

①（明）石星：《议征倭疏》，（明）徐亮辑《万历疏钞》，《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四十三《东倭类》。

②（明）徐桓：《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明）徐亮辑《万历疏钞》，《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四十三《东倭类》。

③（明）杨廷兰：《仕路方清，大奸宜黜，乞斥以昭公道疏》，（明）徐亮辑《万历疏钞》卷一九《纠邪类》。

缓则治其本”原则，认为正当目前“事急”之际，当为“治标计”，提出了“先声以夺其气，用间以离其党，迎击以挫其锋，伏奇以蹶其后”的可为“万全算”的“四策”。^①

当月，张文熙被迫致仕。^②其所提议的“征倭捣巢”之策，亦被搁置罢行。^③

（二）“借兵暹罗”以“荡剿倭巢”的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的爆发，恰逢暹罗使者来明朝贡之时。据两广总督萧彦的奏疏，万历十九年（1591）的这次朝贡，为暹罗国在万历朝的第二次进贡。这批使者于次年进入北京，九月癸未（二十七日）得到了礼部宴请，十月己亥（十三日）则受到了赏赐冠带的优遇。^④

来到北京的暹罗使者，很快就获悉了同为大明朝贡国的朝鲜遭到日本的侵略而几近亡国的时事。他们对之的反应颇为强烈，正使握叭喇自告奋勇地上疏明朝，请求允许本国出兵荡剿日本巢穴。明人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对暹罗使者自请出兵之事有如下的一段记述：

万历二十年九月，经略侍郎宋应昌奏暹罗国正使握叭喇等愿督兵荡剿倭巢。奉旨：夷使所称，具见忠义，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⑤

文中所见的“原差官”，当为此前明朝向暹罗派出的使者。事实上，明朝早在是年六月就已经命令派遣使者向暹罗通报朝鲜战况并咨询联合出兵意向。万历二十年六月，万历皇帝的一份圣旨中，就朝鲜当时的事务，作出如下内容的指示：

朝鲜素效恭顺，为我属国，有寇岂宜坐视！著辽东抚镇官即发精兵一二枝应援。仍发银二万两解赴彼国犒军，大红红丝二表里慰劳国王。还宣谕海上诸国，合兵捣虚，剿此凶逆，以图廓清。年例银亦准给发。钦此钦遵！^⑥

圣旨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些“海上诸国”，但暹罗、琉球这些恭顺属国无疑应该被包括在内。这在可是年八月颁赐朝鲜的一份敕谕中可以得到印证：

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朕今专遣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精兵十万，往助讨贼，与该国兵马前后夹攻，务期剿灭凶残，俾无遗类。朕受天明命，君主华夷。方今万国威宁，四溟安静，蠢兹小丑，辄敢横行，复敕东南边海诸镇，并宣谕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务令鲸鲵授首，海波晏然，爵赏茂典，朕何爱焉？……^⑦

①（明）徐桓：《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明]徐亮辑《万历疏钞》卷四三《东倭类》。

②《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庚子（十四日）条。

③（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程鹏起》。

④《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九月癸未（二十七日）条、万历二十年冬十月己亥（十三日）条。

⑤（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文海出版社，1979年，卷二二六，《四裔考·暹罗》。

⑥（明）侯继高撰：《全浙兵制》第二卷附录《近报倭警》中所收郝杰奏。

⑦该敕谕于八月五日交付给行人薛藩，九月三日薛藩到达义州后正式向朝鲜方面宣读。见《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壬辰（初五日）条和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五年九月己未（初三日）条。

因为明朝早有动员暹罗出兵征剿日本战略意向，所以暹罗使者自请出兵的上疏，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明朝“借兵暹罗”战略的实施。明朝遂令两广总督萧彦选拔一名“能事官员”，与原差宣谕暹罗的明朝使者一道，同暹罗使者一道往赴暹罗国商讨借兵事宜。^①

三、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和明朝的对日战略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明朝响应朝鲜的求援，迅速地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准备。^②在此背景之下，明朝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迅速地调动了大批间谍潜入朝鲜和日本。这批间谍的派遣，系奉“圣旨”行事，其所收集到的情报，亦以禀报万历皇帝为目标。^③他们的行动，对明朝的对日战略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早在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底，由兵部派遣的间谍沈惟敬就潜入朝鲜的日军营中开展间谍活动。^④相对于以侵朝日军为对象的间谍活动，明朝政府派遣间谍潜入日本各地在时间上要稍为滞后。他们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来到福建，在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终于在次年六月渡航日本成功。

其中的一名海商出身的间谍许豫，潜伏在九州岛的内浦港长达半年之久，收集到了大量的日本情报。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圆满完成间谍活动的许豫踏上归途，一个月后回到福建，将侦察到的日本情报向巡抚许孚远作了汇报。一个月后，另外一批间谍亦将其所收集到的日本情报向许孚远作了汇报。^⑤

许孚远将上述情报写入奏折呈递万历皇帝，并在奏折中提出了对付日本的“莫妙于用间，莫急于备御，莫重于征剿”的战略建议：

倭酋倡乱，惟在平秀吉一人，诸州酋长，多面降而心异，中间有可以义感者，有可以利诱者，秀吉原无亲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奇士，密往图之，五间俱起，神祕莫测，则不烦兵戈而元凶可擒，一获元凶，倭乱顿弭，故曰莫妙于用间。

备御之策，频年屡奉明旨申飭，当事诸臣亦云严矣。臣等窃惟，辽阳、天津两地密迩京师，一由朝鲜度鸭绿江而上，一由山东海面乘风疾趋，设有疏虞，令倭得长驱而入，震惊宸极，此不可以不虑。宜将东征之兵挑选，或增至二三人，遣大将二员分屯两地，以防不测，其各省直水陆兵防，更于今日严为整备，俟其入寇吾境，或犄或角相与，戮力歼之，此不可恃其不来而一日可缓者。故云莫急于备御。

然用间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于彼，备御急矣，恐未能使破胆于我。臣等以为，彼不内犯

① 关于明朝“借兵暹罗”战略的缘起、经纬、终结等详细情况，请参考郑洁西：《“壬辰之役”明朝“借兵暹罗”之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②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庚寅（初二日）。

③ 以间谍沈秉彝为例，他于日本侵略朝鲜后奉圣旨探倭情，于次年七月三日回北京向万历皇帝作了报告。见朝鲜《宣祖实录》卷四一，宣祖二十六年（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壬辰（十一日）条。

④ 朝鲜《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丁巳（二十九日）条。

⑤ 关于情报的详情，请参看（明）许孚远：《请计处倭酋疏》，（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敬和堂集》所收，中华书局，1962年。

则已，果其内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与二三大臣定议征讨，特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顺命者宥，逆命者诛，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名其为贼，敌乃可服者也。故日莫重于征剿。^①

事实上，万历二十一年（1593）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许豫等人，除了搜集各种日本情报之外，还和以幸侃（伊集院忠栋）为首的萨摩州高层进行了初步交涉。许豫将接受自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等人的物品“文书一封，旗刀二事”、“盔甲一副”、“倭刀一把”、“鸟銃一对”^②悉数上呈福建巡抚许孚远。

萨摩藩主岛津义久进呈福建巡抚的“文书一封”，其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无疑为此后福建和萨摩之间的交通带来了转机。

万历二十一年（1593）潜入日本的许豫，暂时只是协助朝廷所派间谍的协助者，虽然受到了福建巡抚许孚远的派遣，但其海商身份并未改变。但是，在次年（1594）三月汇报日本情报之后，他很快就被授予“名色把总”^③之职，并于该年（1594）六月被再次派往日本。^④许豫的第二次潜入日本，无疑被委以了更为重要的任务。

如此迅速地向日本再次派遣间谍，系出于福建巡抚许孚远“莫妙于用间”、“莫重于征剿”^⑤的战略理念。许孚远此次向日本派遣间谍，以离间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和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时任福州知府的何继高曾在后来的奏折中对此事有着如下一段回顾：

曩岁〔岛津〕义久遣亲信张五郎至闽，投见原任巡抚许孚远，孚远与臣谋，欲藉久以挑引诸国，共图平酋，令自救不暇，则朝鲜不救自全，中国不防自固，亦一奇也。遂遣把总刘可贤及伍应廉、张五郎等渡海，阳作檄书，一道谕平酋罢兵，令之不疑，而阴结仪后，使劝义久，图酋自效，计甚秘密。^⑥

可见，此次派遣间谍潜入日本，其目的在于“挑引诸国，共图平酋”，交通许仪后，游说岛津义久，离间日本内部发生火并，进而颠覆丰臣秀吉政权。

这次间谍活动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次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刘可贤与岛津义久的军师玄龙一道返回福建，为明、日之间的交通带来了一次新的转机。

但是，当刘可贤和玄龙来到福建的时候，明朝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万历皇帝册封丰

① [明]许孚远：《请计处倭酋疏》。

② 同上。

③ 《大日本古文書》，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家わけ第十六“岛津家文書之三”御文书1236，“明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回文”，第98—99页。《大日本古文書》家わけ第十六“岛津家文書之三”御文书1367，“明国福建巡抚许孚远檄文”。

④ 与许豫同行的明朝间谍还有巡海守备刘可贤、军门赞画姚士荣、名色把总伍应廉，以及萨摩藩所遣使者张昂。

⑤ （明）许孚远：《请计处倭酋疏》。

⑥ （明）陶望龄撰：《歇庵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5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六《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

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之事早已敲定，^① 主张离间日本、谋图秀吉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巡按刘芳誉和福州知府何继高三人也均被调离原职。继许孚远而任福建巡抚的沈桐对交通萨摩之事毫无兴致，很快将玄龙打发了事。朱国桢所撰《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福建观颐沈公墓志铭》对当时的情景有着如下一段记述：

许先生抚闽，欲下十万众勦倭，不得，则移檄覘情伪，而以把兵刘可贤等往。先生至，刘挾倭僧与其众至。先生谓檄中语轻重不可知，驱之则我失信，召至幕府，山川夷险，入奴度中非计，故纾其道，日躑躅榛莽间，戒驿使盛言，新府募练兵，有言媾者立斩，斩已数百人，倭惧，请归，故纵之，遂绝闽浙，颛向辽阳道矣。^②

因为政局的变动而导致的前功尽弃，当事人何继高在事后不无遗憾之至：

[万历]二十三年，可贤与义久军师僧玄龙偕来，时孚远与臣相继去闽，玄龙无可告语，事遂寢息。使其时臣谋获遂，岂有今日哉！^③

此次间谍活动所遭受的挫折未止如此。明朝间谍刘可贤继而又受到了巡按周维翰的弹劾，以私自交通日本之罪下狱论处：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福建侦倭把总刘可贤、赞画姚士荣下台讯，以携夷僧入且受货也。^④

继而，明朝政府又以“刘可贤案”为借口，以颁布诏令的形式在法令上卡断了福建与萨摩的再次交通。《明神宗实录》对当时的情形记载如下：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初，福建所遣侦探日本刘可贤受关白财物，又私带夷僧入境。按臣周维翰以可贤既邀重货，必有轻诺；日本既捐大利，必有厚望。恐因而启衅，因请申飭沿海一带练兵厉械以防未然。兵都覆奏。诏今后沿海地方只宜修整防御，勿得擅遣侦探以生事端。^⑤

万历二十一年（1593）潜入日本的间谍活动，在给明朝带来大量日本情报的同时，也对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这些日本情报，福建巡抚许孚远在提出“莫重于征剿”的征讨日本战略的同时，迅速派遣间谍再次潜入日本——其任务在于离间日本内部发生火并，进而颠覆丰臣秀吉政权。但是，因为当时政治局势的突然转变，明朝将对日战略的重点调整到与丰

① 关于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之事，请参考李光涛著：《万历二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② （明）朱国桢撰：《朱文肃公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不分卷，《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福建观颐沈公墓志铭》。

③ （明）陶望龄撰：《歌菴集》卷一六，《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

④ （明）淡迂撰：《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卷七七，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条。

⑤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六，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丁卯条。

臣秀吉的议和之上，这导致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降的间谍活动和征讨日本战略都被诏令暂行。^①

四、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征讨日本战略的再起

（一）万历二十五年天津、登莱巡抚的设立

万历二十五年，因日本封事失败，朝鲜战火再度燃起。这年九月初十日，明朝在军事布置上作了一个重大调整——万历皇帝下令将原来分属保定和山东巡抚辖地的天津和登莱新设为一个军事区，以原山东右布政使万世德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防巡抚”。^②

之所以设立在天津、登莱设立海防巡抚，乃是出于六天前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沈一贯三人在对日战略布置上的一致提议。^③特别是沈一贯的奏折，对当前的攻战防守形式，分析地尤为深刻。沈一贯认为，“倭长于陆，吾长于水，与倭战于水，则得算在我，其胜十九，与倭战于陆，则或胜或负，尚未可知”，建议“徒自守而不言战，不若使之索倭而战”。他要求政府“多调浙、直、闽、广惯战舟师，相度机宜，进剿釜山、闲山及对马等贼”，指出，“今迤北捣巢，狂虏为却，宜仿此意，行之于海以渐，灭倭必此一举”。因为天津、登莱之地，“北接辽东，南接淮安”，与南北两地可以“臂指相使，首尾相应”，且可与朝鲜的“经理之师”、“相为犄角”，又能为泛海而来的浙、直、闽、广水军提供栖泊之所，所以在天津登莱设巡抚一员，“专管海道战守事宜”，尤为当时的战略急务。^④

可见，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天津、登莱巡抚的设立，是明朝对日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调整，它是明朝重视海防建设、强调积极进取的对日战略的一个标志。这一战略的最终目的在于，利用海军优势，积极主动地“索倭而战”，实现“捣巢”、“灭倭”的宿志宏愿。

（二）万历二十六年“捣巢之策”的再起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初，明朝在对日战略上再次作了一个重大调整。《明神宗实录》对之有如下一段记录：

朝鲜闲山失利，东方亟索舟师，阁臣议募闽省惯海商船以资防剿，御史徐兆魁言其不便，议欲选兵繇陆而行，并委道臣赴淮造船兼议捣巢之策。兵部覆称，募船未便，自当停止，日来各处抽取额兵额船已足经略原调之数，所议征兵于闽，造船于淮，亦宜并寝。至于关酋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怒，已非一日，纠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举事莫先于浙，尤莫便于闽、广，以日本多两省之人，可以响应，两省多近洋之国，可以结联，加之商贩杂出其间，可以别用，是在各督抚同心秘计，随便酌行，如忠义可鼓，勿待正兵，事

① 关于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及其活动情况，请参考郑洁西：《万历二十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東アシア文化遷流》第2编第2号。

②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戊戌（初十日）条。

③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戊戌（初四日）条。

④ 同上。

机可乘，勿待奏报，而一切假之便宜，勿以议论束缚，致令制肘。上是其议。^①

此次朝廷所提出的“捣巢之策”，显然袭承了万历二十二福建巡抚许孚远“莫妙于用间”、“莫重于征剿”的战略理念。明朝企图利用日本国内的矛盾，“纠合出奇”，与中国沿海一带的滞日明人，邻近闽广两省的近洋各国一起，实施征讨日本的“捣巢之策”。鉴于此前朝廷的议论制肘了地方的行动，万历皇帝下令对一切捣巢行动“假之便宜”，授权各省督抚可“勿待正兵”、“勿待奏报”而“随便酌行”。

实际上，此前一天，明朝为了贯彻征讨日本的“捣巢之策”，已经作过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

调广西总兵童元镇于浙江，调浙江总兵李应诏于广西，各镇守。兵部言：“关白发难，金谓捣巢可以牵其内顾。童元镇熟识岛情，往年曾与捣巢之议；李应诏清介不扰，适与抚蛮相宜。”故互相更调。从御史唐一鹏之议也。^②

童元镇自万历十九年（1591）起由广西调任广东总兵，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复改镇广西。^③在其镇守广东任内，曾有“借兵暹罗”战略的提出及其实施。之所以选择童元镇去“泛海捣巢”，乃是因为他曾任广东总兵，“熟识岛情”，“往年曾与捣巢之议”。

关于朝廷此次“捣巢之策”提议，史籍上并未留下多少记载。但是，它确实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其中最为著名的响应者当属福建巡抚金学曾。金学曾为了实施朝廷提议的“捣巢之策”，首先在人事上作了特意的安排。《明史·沈有容传》谓：

日本封事坏，福建巡抚金学曾欲用奇捣其穴，起有容守浯屿、铜山。^④

沈有容系当时的名将，金学曾之所以起用其人，实欲在征讨日本的“捣巢”军事行动中大用其才。将时人陈第曾所作的《送沈士弘将军使日本》七言一首，即为赠予沈士容的侯别之诗：

去岁轻裘下海辄，雄心今抵萨摩州。千层巨浪乘风破，万里孤帆向日浮。曲逆捐金成反间，班超提剑取封侯。匡时事业怜余病，期尔凌烟阁上头。^⑤

其中的“曲逆捐金成反间，班超提剑取封侯”两句，乃借西汉陈平离间西楚君臣而令汉高得天下，以及东汉班超出使西域立功封侯两个典故，比拟沈有容出使日本所肩负的重大使命，由此可以概见时人对他的征讨日本所寄予的厚望。

但是，沈有容潜入日本的预定计划最终并未实施。陈第为沈有容所作的《海坛去思碑》谓：

①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己亥（十三日）条。

②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戊戌（十二日）条。

③ （清）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二四七，《童元镇传》，中华书局，1974年。

④ （清）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二七〇，《沈有容传》。

⑤ （明）沈有容撰：《闽海赠言》卷五，《律诗七言·送沈士弘将军使日本》。

丁酉秋，闽海上警闻，大中丞金公闻将军贤，罗之海坛。……时朝议欲捣倭巢，拟以将军潜经略其地。抚台强予之千金，令贸货假往兴贩，将军固不受；竟求付同船商，及弗果往……^①

可见，沈有容在这次的“捣倭巢”计划中虽然被委以“经略其地”的重大责任，但是他的日本之旅却最终并未成行。

不过，金学曾所派出的另外一批间谍顺利潜入了日本，但是他们的活动，只局限于对九州萨摩藩实施预期的反间活动。^②

万历二十六年重新提起的“捣巢之策”，虽然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行。时隔三年之后的对日间谍活动，只能算是万历二十六年再次征讨日本战略的一个前奏，而真正意义上的征讨日本战略，则因为当年战争的突然结束而嘎然而止。

结语

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1598）八月十八日，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寿终正寝于伏见城，遗言日军从朝鲜撤兵。当年十一月，日军全线逐次从朝鲜撤兵。除了十七日萨摩藩的岛津义弘一部在露梁海战中遭到重创之外，其他各路日军均顺利撤回日本。对于日军的全师而退，曾以通信使身份随同明朝使者册封丰臣秀吉的朝鲜官员黄慎不无痛愤之至：“伏以三路凶酋一时网漏，虽有南洋之捷，不足以泄此愤。岂不痛哉！”黄慎认为：“天兵今日退去，则此贼明日必至。寇在一日之程，望教于数千里之地。吁！亦非计也。”故而他提议明、朝两国即刻联和出动海军征讨日本对马岛，“选浙兵七八千，与我舟师协势进驻，一举渡海，掩其无备……”他认为，如果能够成功讨伐对马岛，可保朝鲜“十年无事”。^③但是，黄慎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明朝和朝鲜两国政府的注意。^④

事实上，明朝在此次战争中的战略取向，“来则拒之，去则不追”^⑤这一保守意识占了主流。战争一告结束，明朝考虑的不是穷寇猛追，而是迅速从朝鲜抽身而退。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万历皇帝在颁给朝鲜国王的敕谕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既定方针：

不杀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倭虽遁归，族类尚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兹念经略尚书邢玠振旅旋师，量留经理都御史万世德等分布偏师，为王戍守……吾将士思归，輓

①（明）沈有容撰：《闽海赠言》卷之一《碑·海坛去思碑（万历庚子孟夏勒）》。

②〔朝〕鲁认撰：《锦溪日记》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十六日条，《文禄慶長役にお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所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③〔朝〕黄慎撰：《秋浦先生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65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再版发行，卷一《疏札·请讨对马岛疏》（戊戌十二月）。

④〔朝〕尹拯撰：《明斋先生遗稿》，《韩国历代文集丛刊》136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再版发行，卷四十二《行状·秋浦先生黄公行状》。

⑤（明）宋应昌撰：《经略复国要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三十八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七《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轮非便，行当尽撤。……^①

16 世末发生于东亚世界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对万历明朝的对外战略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明朝政府在出兵援助朝鲜、与日本停战讲和之外，也曾考虑过直接征讨日本这一积极主动的进攻战略。早在战争前夜，明朝就对日本具备足够的警惕，并已开始酝酿先发制人的征讨日本战略。战争发生后，这种积极的进攻性战略在明廷中反复提议、不断变迁。但是，明朝的各种征讨日本计划最后都以未获真正实施而告终结。征讨日本的这一进攻性的战略，虽然仅仅是明朝对外战略的一个侧面，对整场战争也无太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就认识明朝政府整体的对外战略而言，它的补充和修正意义不容忽视。

^①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初八日）。